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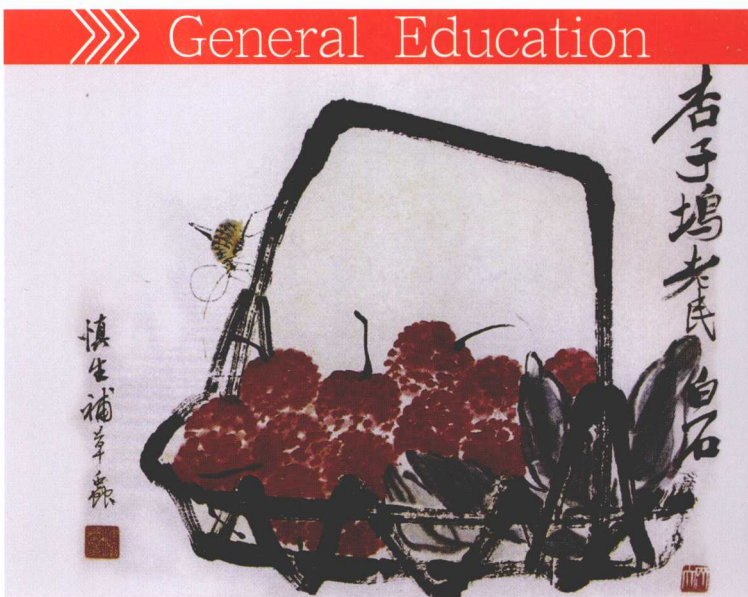
大学生 GE阅读

(第10辑)

王晓纯 吴晚云 ◆ 主编

General Education

傅国涌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雷 颐
晚清大变局
秦 晖
辛亥百年遗产
张 鸣
近代史上的失语症考察
史仲文
观察极左思潮
汪民安
论洗衣机
岳 南
陈寅恪失明经过
止 庵
刘半农片段
金 雁
“黄埔一期”考研记



013032285

鳳凰網讀書
book.ifeng.com

郑重推荐

C49
10
V10

大学生 GE阅读

(第10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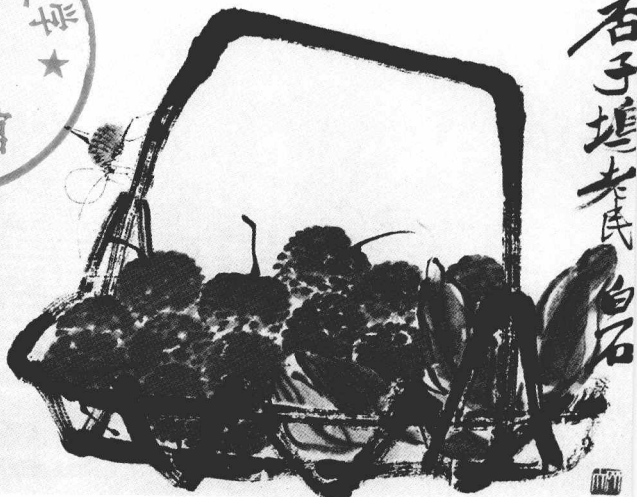
王晓纯 吴晚云 ◆ 主编

General Education

傅国涌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傅国涌
晚清大变局
秦晖
辛亥百年遗产
张鸣
近代史上的失语症考察
史仲文
观察极左思潮
汪民安
论洗衣机
岳南
陈寅恪失明经过
止庵
刘半农片段
金雁
“黄埔一期”考研记



慎生補筆



北航

C1641061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生 GE 阅读. 第 10 辑/王晓纯,吴晚云主编.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3
(通识教育丛书)

ISBN 978—7—5657—0666—0

I. ①大… II. ①王… ②吴… III. ①社会科学—青年读物 IV. ①C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2548 号

大学生 GE 阅读(第 10 辑)

主 编 王晓纯 吴晚云

责任编辑 赵丽华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责任印制 张 玥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30×988 mm 1/16

印 张 20.5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57—0666—0/C · 0666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通识教育丛书

北方工业大学《大学生GE阅读》编委会

学术顾问：汤一介 江 平 乐黛云 张传玺 欧阳中石

杨 辛 王树人 梁小民

主 编：王晓纯 吴晚云

副 主 编：罗学科 魏常海 史仲文（执行）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特邀编委：王志刚 王 俊 方朝晖 叶培贵 史杰鹏

乔继堂 庄永志 李虎群 吴 思 汪民安

沈伯俊 张文举 张平仁 邵 建 周 勇

庞 毅 赵 强 夏可君 郭洪体 梁满仓

鄢晓霞 颜吾芑 檀作文

海外编委：乔治·桑泽 张英进 郭苏建 崔淑琴

编 委：王文革 王鸿博 王景中 王德岩 田红芳

曲 辉 孙德辉 李云驰 李 肖 李 颖

吴永林 邹建成 张加才 张 轶 张常年

周 洪 屈铁军 赵玉琦 秦志勇 袁本文

郭 涛 董树宝



目 录

大学讲堂

我的性社会学之路

- 构建宏大叙事中的生存体验 潘绥铭(3)
- 晚清大变局:改革与革命的赛跑 雷 颐(16)
-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傅国涌(29)
- 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余三定(44)
- 经典阅读:《孟子》二题 张加才(49)

专题专论

- 观察极左思潮 史仲文(57)
- 辛亥百年遗产
- 几个层面的观察 秦 晖(75)
- 作为物的“有”与作为道的“无”
- 综览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有无”观念 刘军宁(84)
- 论《中庸》的自然正义观与政治理想 单 纯(97)



论洗衣机	汪民安(111)
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英语系本科教育情况考察报告	杨 建(121)
试探唐笈书陈寅恪诗抄本之下落	谢 泳(137)
从赵本山现象说开去	熊元义(146)
德勒兹哲性诗学:西方文艺思想传统及其当代拓展	麦永雄(151)
哈罗德·布鲁姆:在“末日”危机中坚守属灵之城 ——从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说起	高 永(162)
中国战争题材文学的深度开掘 ——评黄国荣长篇小说《碑》	汪守德(168)
文化创意遭遇的六种压抑	王文革(180)
生态文明初解	尉 峰(192)
俄国 19 世纪唯美主义文学概说	曾思艺(198)
中唐古文运动前儒学发展样态及啖助贡献	李珣平(212)
中唐《春秋》学的革新	程 露(221)
泰国的汉语教育	郑馥雨(227)

评书评人评事

名优逸事	汪曾祺(237)
创业有方 交班无术	王充闾(241)
书法 太极 长寿	冯大彪(251)
陈寅恪失明经过	岳 南(254)
刘成禺与全编本《世载堂杂忆》	蔡登山(263)
刘半农片段	止 庵(269)
“黄埔一期”考研记	金 雁(272)
老省城里的那些老学堂	黑 马(279)
寄语大学新生	甘·福洛肯(285)



近代史上的失语症考察	张 鸣(290)
搬洋人石头砸自己的脚(外五篇)	游宇明(295)
历史随笔一组(六则)	王国华(306)
在《寂静的春天》里呐喊	杨晓敏(314)
孟买大学一瞥	张 充(318)

大学讲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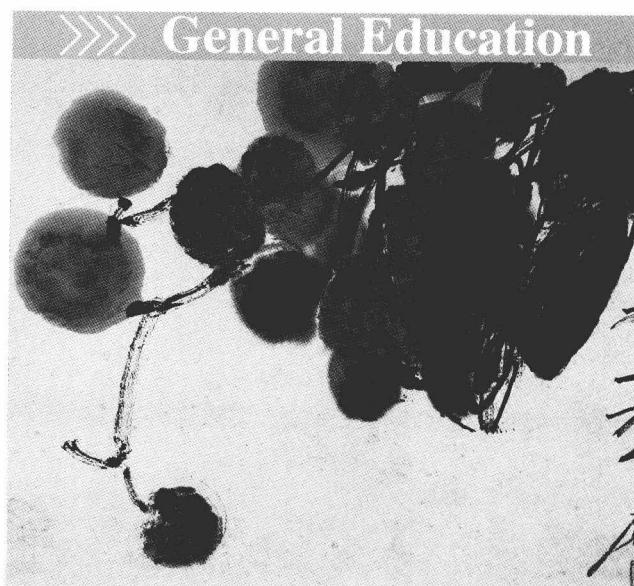
我的性社会学之路

晚清大变局：改革与革命的赛跑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经典阅读：《孟子》二题





我的性社会学之路

——构建宏大叙事中的生存体验*

潘绥铭

一、不是原因的原因

我出生在一个高级干部的家庭,但是9岁时父亲就倒霉而且被发配了,直到我30岁才平反离休。所以我并非高干子弟,那个圈子也绝不认我。15岁到35岁,我平均三年左右就换一个居住地,所以只能说是北方人,而不是北京人。当过红卫兵、狗崽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工农兵中专生和机关小职员,所以哪个阶层也不像,私下里倒希望是“土匪”出身。

青春期始于“文革”前,上的又是男校,所以对什么叫“无性文化”颇有些感受。下乡等于白下,并没有真正了解农民,也没有增加任何异性交往的知识和经验,只是记住了一些东北和内蒙古农村的口头性文学。有一次听一个不太老的老头唱“十八摸”,大概学生气的反应太明显了,老头似乎自言自语地说:过去的人太穷了,娶不起媳妇,只好这么唱唱,快活快活嘴。后来我觉得,这才是我的性学第一课。

1975年以后有幸接触了“社会弃民”,包括卖自己眼球的人,知道不少当时两块钱一次的卖淫和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没断过的工矿区“买鸡蛋”的故事。所以直到现在也不肯同意“死灰复燃”或“贪图享受”这一类关于性服务小姐的人造神话。而且,当时没人听说过“西方性解放”。

这种经历在那一代人里太平常太平淡了,甚至是很欠缺的,所以我觉得生活经历跟日后研究性学,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压抑只能产生躁动和盲动,追求知识只能由知识来启动。

1981年,我在女儿8个月时,以同等学力考上了东北师大历史系的研究生并最终

* 本文系潘绥铭先生2011年9月在台湾中央大学研讨会上的演讲。



获得硕士学位。研究什么？世界中世纪史。为什么？因为我在自学历史时（那时还挺时髦），觉得只有这一段最糊涂。

上研究生是一种资格，看书和拜师的资格。导师不经意的一句话一直是我的座右铭：“一个人一辈子能干多少事？”正因如此，我才该抓紧干，至少把我占据的这点时空染上自己的颜色。正因如此，我才不该期望过高，挨骂或无成果是必然的。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接触到性研究。学世界古代史要从原始时期学起，东北师大又保存了一大批 50 年代之前的英文著作，所以我一扎进书库，马上就迎头碰上许多记载原始性风俗与性文化的英文书。第一本看的是什么已记不清了，但第一年中印象最深的书是德国人类学家弗林格尔 1921 年写的《原始人的性生活》。

弗林格尔在性学史上没有多大地位，在人类学史上的作用，我也还没有考证过。但当年把我“震住”的，并不是他的议论，而是他所记载的、我这个中国已婚男人别说知道，就是做梦也梦不出来的那些千奇百怪的人类性行为。例如，直到写此文之时，我也不能不对爪哇男子在自己阴茎上穿 6 个窟窿，再插上 6 根小木棍，以示其社会地位感到强烈的好奇；不能不惊讶地中海西岸一些部落的母亲，居然会用嘴含着青春期儿子的阴茎，以使他平静下来；不能不想象南美母亲在成年破身仪式上掏出并吃掉女儿的处女膜时，该是怎样一种情景。

当年的震惊，现在很难描述。不知查了多少英文熟词，甚至有好多增删一个字再查查字典，因为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生怕是我理解错了或者书上印错了。再早下乡的时候，有一个男知青姓焦。别人常故意问他：你贵姓？他总是回答：姓焦。别人就偷笑。直到后来全连男知青差不多都狂笑时，我才明白，原来是“性交”！（现在想起来，还为焦某扎心疼）这就是那时我的性知识基础，怎么经得起上述“性描写”的狂轰滥炸？

一旦知道，就更好奇。我写第一本书时用过和没用过的资料卡片一共有 5100 多张，全都是读研究生时抄录下来的。有一次回家，小偷摸见我兜里装满卡片的笔记本塑料皮儿，以为是钱，连试 4 次终于偷走。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对别人进行“性教育”吧，但愿他看不懂。

后来又查到一套 30 卷的《东方圣书》。除了神奇的印度经典（例如《卡马经》，又译做《爱经》，我就是在这套书中第一次读到），我发现居然还有中国道教的一些性的教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房中术”的皮毛。但当时既不了解道家史和道教史，也不知道还有房中术此物，再加上英文很难返译成准确的中文原文，因此当时并未深究。直到 1985 年，我表兄留学牛津，寄回来国外博物馆里保存的一些中文古代文献的复印件，我才开始真正了解房中术和中国古代性文化。说来有趣，当时海关的同志慕名找我，想讨论一下进口邮检中如何掌握尺度。刚谈两次，表兄的邮件便被检查出来了。



科长哈哈一笑,予以放行。但此后再不为例,还打电话来解释:即使寄给你,也不行。当然,在那时候,换了我也会这样做的。

毕业后,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了。1985年,人民大学号召青年教师开设新课,我就报了一门《外国性观念发展史》。没想到领导专门在大会上予以表扬。于是就开讲了,而且是本科生的必修课,骂我“脸皮厚”(首届学生语),也得听。此后,副业和隐业变成了正业和显业,除了1989年下半年停了一学期外,一直讲到今天,不过已经扩展为研究生课程《对于性的社会学研究》了。如果加上成人教育和干部进修班,听过我的课的人数已经超过孔夫子的弟子了。

既是切身经验,又是授课法总结,在讲一个学期(54个课时)的课时,我总是在第一堂课就狂轰滥炸,把人类性行为的一切细节通通倒出来,否则,听课的人一周受一次刺激,就根本无法听其中的学术了。这叫强制脱敏。刚开学时,就连已婚研究生都喊受不了,但到期末时,即使纯情女生也能讨论《金瓶梅》中的性细节了,而且脸不变色心不大跳。当然,如果是一次讲座,就要把性细节放到最后,可怜天下害羞心嘛!

还有什么故事?基本没了。一直有些朋友(尤其洋的)关心我所遭受的阻力甚至磨难。但其实没那么多,更没那么严重。原先的顶头上司劝过停课,老一辈先生发过火,相当高的头头下令调查过我的情况,公安和保安审查过我的身份,但是,一来我解释清楚后就再没有什么,二来都是他们的职务使然,三来这些对我并没有构成压力,更形不成阻力,说它干吗?倒是近年来“性学热”后,有位记者问我:当初的选择是不是因为新学科更容易突破?我只好说:现在这么想还差不多,你太年轻,不明白我的那个根本无从选择的时代。

最大的苦恼是学术进展上的。是不是这块料的疑问会跟人一直走到退休那一天。

二、走向“性社会学”

“性革命”与“性化”的话语

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尤其是开始运用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之后,我日益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性的革命。在参考了欧洲1920年代和美国1960年代的性革命的文献之后,我逐步明确了自己的想法,把中国的性革命总结为:生殖革命(独生子女政策的严厉推行)、性表现的革命(情色的日益公开化)、性关系的革命(各种非主流现象)、性行为的革命(性生活丰富化)与社会性别的革命(性别多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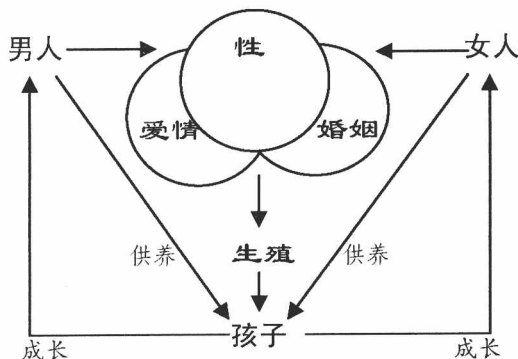
从2000年到2010年,在连续主持三次全国随机抽样的性调查之后,我觉得中国人的性已经出现了质变,所以沿用了英文中的Sexualize(ation),把它作为中国性革命的后续发展。我给出的定义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与性联系起来,日益成为一种很少遭到反对的社会时尚。



这样的总结,其实没有多少可以引经据典的学术依据,主要来自我个人对于中国社会的体验与感悟。“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已经 30 岁了,整个青少年时期完全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因此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最近 30 年来性的变化之剧烈。它已经超出了我年轻时候的任何梦想。我当然欢迎这个剧变,因此把它命名为性革命。但是到了 21 世纪,我越来越多地看到了一些我不那么喜欢的变化,也在调查中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困惑或者反感。这促使我使用“性化”的概念而且认定:性的精神禁欲主义已然逝去,性的时尚则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主要敌人。

初级生活圈的分析框架

这是我在 1995 年首次发表的,主要借鉴了西方的“供养制理论”,见下图。



从这个分析框架中,我提出了“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性与生殖的相对分离,是中国性革命的独特来源”的命题,据中国留学生反映,这在国际性研究的领域中引起了注意。

我是我家五个子女中的老三,但也是第一批独生子女的父亲。对照我终生碌碌的母亲与我坚持到下岗的妻子,痛切感到生殖革命对于女人和男人的巨大作用。

三、从统计学走向“论方法”

问卷调查的崇拜与反思

1986 年我就开始做性方面的社会调查,因为我觉得,研究性的历史最终还是为了解释性的现在,还不如直接去了解现状。另外,我那时已经看了许许多多关于性的抽象思辨和议论,不免产生疑问:这些议论的依据何在? 与其我们互相瞎吵一顿,还不如首先调查一下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究竟在干些什么。

第一次调查 603 人,都是听过我讲性社会学的人。其中三分之二是成人学员和干部专修班的学员。那时我对计算机和统计学一窍不通,全靠我的朋友史希来,后来他



一直手把手地教我,直到我在1991年时最终能够独立处理和分析调查数据。

第二次是1989年初,谭深带领我和史希来、周孝正去上海,随机抽样调查了参观《人体油画大展》的19万上海观众。

以后的速度就加快了,共有:对27城市1279人的调查,对北京市区977人的调查、对全北京所有大学生的抽样调查、对165名男同性恋者的调查、运用《金西报告》中的问卷对中国读者的调查、对南方三城市非婚性行为的调查。

观察也是一种调查。从1985年到1989年,每个夏天我都在日落之前去城市的公园里,测定当众公开亲昵的异性伴侣的亲密程度和他们当时所处的场景,最后总结为一个数量化的亲昵行为与场景的相互关系模式。这个报告在国外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但是调查来调查去,我逐渐发现,目前中国的性学研究虽然也很缺乏调查,但更缺乏的是理论,尤其是提不出较好的假设,甚至根本说不清自己想调查什么。例如我的第一次调查,现在看来幼稚之极,把性知识水平、性观念取向、性行为实况全都混在一起来调查,而且自己也不知道它们之间可能有什么关系。结果只能算出来一些简单的百分比,例如有多少人看过色情录像,有多少人用过后面进入的性交姿势。但要命的是,这些百分比并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而且根本无法解释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后来好多了,调查越设计越合理与精细,许多重要的相关关系被发现了,一些可能性很大的原因可以推测出来了。但是在基本理论上还是进展甚微,还是无法提出好的假设。逼来逼去,我似乎被迫又转回去,重新思考那些当年非常诱惑我的“大问题”。所以才有了“性存在”的一系列概念和理论模式。

自从1998年去调查红灯区以来,我对问卷调查的崇拜出现了巨大的疑问。尤其是2000年、2006年和2010年主持了全国随机抽样的性调查之后,在不断清理数据与统计分析的过程中,我根本无法把那一个个的数字,还原为我在调查现场所见到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中国人。由于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龙工作”(从问卷设计到现场调查到统计分析到文章写作),所以更加感受到问卷调查不但存在严重的真实性的问题,而且根本就是在剪裁生活,根本就是无奈之举而绝对不是最佳选择。再加上1998年以来,我在多次研究性产业的实践中开始使用与论说“社区考察”的定性研究方法;就更加关注社会学调查方法的学术探索。

歪打正着:社区考察的调查方法

在1997年里,我考察了珠江三角洲的B镇、中南腹地某工业城市旁边的开发区和湘黔交界处的某个私人云集开采的小金矿。在《存在与荒谬》中,对于珠江三角洲B镇的考察报告,篇幅最多。

在接下来的1998年里,我决定放弃那个开发区和小金矿,集中力量研究珠江三角



洲的B镇。这是因为,在其他那两个社区里,“性服务”的形式比较单一,在发展阶段上也比较落后,而B镇的“性产业”则层次更多,社区的聚合程度更高,而且已经发展到市场经济的自由雇佣制度了。

1998年2月13日到3月5日、7月11日到29日、12月25日到30日,我三次到B镇和它所属的S区,进行了总计46天的社区考察。^①

1. 什么叫“社区考察”

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所谓社区考察应该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和规范:

所研究的社区,应该具有足以说明问题的、明确的时空,既包括确定不变的地理范围,也包括足够长的一个时间段。因此,蜻蜓点水式的多地巡游,显然不能算作社区考察。

所针对的社区,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而不仅仅是一个行政管辖区或者简单聚合的一群人。

从具体方法上来说,所谓社区考察应该是尽可能多地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研究的侧面和层次也应该尽可能多地。

一般来说,社区考察仅仅适用于典型调查或者时点调查,无法代表任何一个相当大的总体。同时,从基本性质上来说,它也主要是定性描述,无法进行统计分析。因此,社区考察既不是至高无上,也不是百病包治。但是,由于在方法论上,它处于个案访谈与随机抽样调查之间的位置上,因此它也具有一些无可替代的优越性:

首先,社区考察更容易了解到某个人类集群所处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人文传统和心理氛围。因此,在解释人类行为或者社会现象时,可以比个案调查具有更多的代表性、可比性以及环境感;可以比问卷调查获得更多的相关因素、参考情况和纵深资料。尤其是,如果我们并不那么追求个人故事的生动与量化数据的精确,那么社区考察反而可以在确定的时空内,更全面地把握住所研究的总体,更深刻地揭示其内外纵横关系与机制,更贴切地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现象的众多影响因素。

其次,在同一个社区考察之内,可以把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个案与问卷、观察与访谈、历史资料与现实资料等等更好地结合起来,形成更为综合的研究成果,而在其他研究方法中,上述每一对具体方法之间往往都存在着矛盾,甚至水火不相容。

再次,在社区考察中,研究者可以更多地、更直接地、更全面地获得对于该社区的整个生活的直接体验、感受和理解;更容易发现那些无法量化和统计的、无法在个案中表现出来的,甚至根本无法言传、无法观察的活生生的资料。也许,这就是社区考察最大的优点。

^① 潘绥铭:《生存与体验——对一个红灯区的追踪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社区考察的内容

笔者在本书所讲述的社区考察中,除了一般的调查与观察方法之外,主要使用了以下一些方法:

定时定点的监测(“蹲坑”)

挨门挨户的粗浅访查(“问价”)

直接住在某场所里进行的摸底调查(“入住考察”)

从经营角度访谈老板(“取经”)

以“闲人”的身份访谈小姐(“聊天”)

模仿嫖友访谈嫖客(“同行交流”)

在社区考察的过程中,笔者主要从事了四方面的工作:

收集官方资料

笔者从各个政府部门和管理机构,收集了该镇和各个管理区(相当于内地的村)的基本统计资料,尤其是与性产业密切相关的那些统计资料。此外,笔者还访谈了一些官方人员。

定时定点的监测统计

笔者运用现场观察的方法,对性产业的多种场所,进行了定点的时段观察记录以及时点观察记录,然后加以统计处理,以便推算性产业的实际规模,发现其活动特点,确认其活动规律。笔者观察的重点是“小姐”的情况和她们可见的活动。

个案访谈

笔者对许多性产业的当事人和直接相关人员,进行了非量化的个案访谈,对其中的重点人物,还进行了追踪访谈、客观观察和搜集旁证。

显然,这样的个案访谈与目前所发表的大多数个案研究有所不同。笔者的研究重点并不是当事人的个人历史或者从事这个职业的个人原因,也从来不想仅仅靠这些个案来推断性产业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原因。笔者只是试图通过这些当事人,这些直接就业者和亲身体验者,从内部来了解和分析整个性产业的状况。这样一个研究角度,是这次社区考察中个案访谈的灵魂与最重要价值所在。

访谈调查

笔者对当地居民(包括流动人口)中的各个不同阶层分别进行了访谈调查。访谈的主要内容是:

了解整个社区的综合情况;

从局外人的角度上,了解当地性产业的发展史和现状;

了解当地一般公众,尤其是妇女,对于性产业的认识、评价和可能作出的选择;

了解性产业与整个社区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与相互作用;



了解社区内的分层。

笔者的基本假设是：在一个社区里，所有的居民（包括流动人口）都可以根据他们与性产业的关系，划分成五个阶层：

性产业的直接从业者；

客观上从性产业的存在中获得好处的人；

与性产业毫无瓜葛的一般公众；

自己或多或少受到性产业损害的非直接从业者；

作为集体和制度的各种官方人员（当他们作为个体存在时，则可以归入前四个阶层）。

不同的阶层在看待和评价性产业的时候，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因此也就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参照系。

3. 考察侧重点

首先，考察不同阶层对性产业的不同态度，分析他们各自的态度对性产业发挥了何种作用。

其次，分析不同阶层的不同态度之间，存在着哪些差异、矛盾甚至冲突，以便深入理解整个社区在性产业这个问题上，究竟是如何构成以及运行的。

再次，针对同一个问题或者同一个现象，对照比较和互相检验不同阶层的不同说法，以便尽可能地获得整体的认知。

尤其是，在五个阶层中，第一个（性产业的直接从业者）所描述的性产业的情况，与第五个（官方人员）所描述的，简直有天壤之别。因此，笔者极其重视对于一般公众的访谈调查。这是因为，在五个阶层中，一般公众这样一个群体处于中间的位置上。访谈他们所获得的资料，可以用来核实与检验那些从社区管理机构获得的各种统计资料；同时也就对性产业参与者的主诉中的有关方面，进行了测谎。

从事后的系统分析结果来看，上述对于研究对象和考察方法的设计，保证了研究者能够获得足够的、全面的、更加真实的资料，证明这些设计是成功的。^①

主体建构视角的提出

在同时进行全国问卷调查与性产业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在黄盈盈博士的合作下，我终于在2007年发表了《“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一文。

这种“性的主体建构视角”可以初步表述为如下两个方面：

建构的视角反对把“性”视为“天然的静态存在”，强调对于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

^① 潘绥铭：《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